探寻中国改革之路: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

巴里·诺顿

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经济所90华诞的庆祝活动。40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并转向市场经济。事实上,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尽管这条道路并不顺利,但中国选择走这条道路的结果是创造性的爆发以及活力和财富的爆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后来成为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也是保持较高经济增速时间最长的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成就非常巨大,而且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陈云曾经说过"摸着石头过河"——一定要非常小心地找到进步的道路,很多人也重复了这个观点。由于不能预知改革的终点,所以,在一开始讨论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意义不大。邓小平说过:"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要释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同时要确保改革终点的开放性。随后,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中国人民面对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并且成功应对了这些挑战。

20世纪80年代,我非常荣幸地结识了经济所的一些领导。我见过吴敬琏先生,在他1983年、199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我结识了他。还有刘国光先生,他在1986年访问美国,我当时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后来我与一些学者合作。在董辅礽先生的领导下,我和经济所的同事们一起研究国有企业的运作和改革。我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显示,经济改革由市场化所驱动,它在影响着国企的行为。市场化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性的作用,来引导改革的方向。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也来到这里,所以我也非常高兴。

最重要的是经济所搭建了一个能够让所内外的学者都能充分讨论重大改革问题的平台。在孙冶方先生和其他领导的带领下,经济所培养了众多经济方面的人才,并外溢到了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另外,还有很多年轻的经济学者也来到经济所工作。有关经济改革的讨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并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鼓励,让这些年长的和年轻的经济学家都参与讨论。对理论的探究和讨论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也是过去四十年的一个重点。他们在讨论中找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这一路径的特点是循序渐进,以不平衡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引进不同市场要素;同时,保持现存的机构和体制,但是对其进行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和调整。

在中国的成功和苏联的失败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对照。世界已经承认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政策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改革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朗。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奇迹是相互联系的。刚才蔡昉教授也提到,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21世纪初期,这些曾经有人口红利的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所以,这些因素共同起了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改革推动了快速发展?不是的。它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改革催生了积极的因素以及更高效地释放了其潜力,包括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红利调整以及其他因素。当时,经济学家并没有关注这一点。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这种改革的战略,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种结构性问题。当时,经济所

*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

有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顾准先生，他曾告诉吴敬琏，中国和日本有着同样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中国能够实现和日本一样的经济奇迹。而且，作为经济学家，有责任去为这种奇迹的发生铺路搭桥，做好准备。他在 1972 年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变为了现实。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改革，能够带来经济奇迹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压力——他们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看一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时候，中国把所有的投资都放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很少投资到新兴制造业以及小型零售业，包括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同时，劳动力数量在不断快速增长。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放开市场，创造更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需求，就能行之有效，其回报也会立竿见影。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劳动力数量在快速增长，政府必须要调整政策，更多关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在劳动力数量上升开始趋缓之后，富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了城镇，并开始了城市化。在这个改革时期，我们并没有关注其中某一个方面，经济改革主要是市场发现的过程。换句话说，经济改革打开了新的需求领域，特别是从农村改革开始创造了新的市场。这就是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规律，尤其是维持二十年增长的规律。

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刚才蔡昉教授说过，这种奇迹增长的时期已经结束了，2010 年就已经结束。GDP 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意味着立竿见影的市场发展的回报已经开始减少。在 40 年前，可以说，中国人口红利带来了很多机遇，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变革，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出调整，从市场发现转向产业政策，再转向高科技产业政策。事实上，中国的产业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一方面要找到现存的市场，另外一方面要引入由政府指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未来可能存在，所以政府去进行政策扶持是重要的。这种做法既要付出成本，也有潜在的收益。问题在于，一定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做出平衡。成本包括，改变未来的市场，现有的市场会受损，所以投资回报率会受损。另外，投资回报发生在未来，其风险更高。毫无疑问，未来的投资回报率会下降。再有，未来全球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对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体制机制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

当世界面对着一些根本性挑战的时候（有些挑战刚才周小川副主席已经提到了，他也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这个挑战），要意识到，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起到引领作用。中国在过去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尤其是过去三十多年在经济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尽管不同国家之间有摩擦，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贡献和领导力可以起到非常巨大的正面效应。说到领导力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经济能够指出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未来会朝向何方发展。但是，中国比其他国家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来管理这种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愿意学习中国的管理经验。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何 伟）
（校对：杨新铭）